



周文宪老人(现年98岁)向王勇讲述支前的故事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从家族记忆出发

王勇说,选择支前民工这个题材,其实是一条注定会走的路。这不是一项访谈任务,也不是一次简单的选题立意,而是一段关于血脉、信仰与人民的回响。

他的家族中,有六位长辈曾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——其中,曾祖父、爷爷、外公,都是地道的中原农民。小时候,王勇常常坐在他们腿边,听他们讲那场没有硝烟却异常艰苦的战斗。“他们说,推着小车拉军粮,走几十里泥路不歇脚;他们说,晚上睡地铺,白天照样送弹药;他们说,解放军吃不饱,他们就自己先饿着……那时候年纪小,听不懂战争的重量。”

从2008年开始,王勇用了17年,行走在豫皖苏鲁交界的乡村田野,访谈了300多位支前民工,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头衔,也没有留下雕塑与丰碑,但他们的汗水、脚印、牺牲,汇聚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力。

最打动王勇的地方,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访谈中,感受到的那种集体的声音。

“你为啥愿意支前?”王勇问。

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:“共产党领导我们打仗,是为了咱穷人有饭吃、有地种。”

没有口号,有的只是朴素而坚定的信仰。王勇注意到,当年的动员书不是一纸公文,而是一场场“推心置腹”的夜谈,是一场场以真情换真心的沟通。正因为如此,才有数百万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奔赴前线,才有小推车会师,胜利会师。

做这个题材这么多年,王勇也常被问:“你一直讲他们的故事,是想表达什么?”王勇的回答是:“想把那些埋在黄土地里的声音重新挖掘出来,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,我们的胜利不是从天而降,而是从一车车粮草、一捆捆布匹中滚滚而来,是无数个无名之辈的共同选择。”

找到这些支前民工并不容易。

淮海战役已经过去76年。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,历史的镜头却迟迟没有聚焦那些默默无闻的支前民工。王勇开始寻访他们时,老人们大多已年近八旬,记忆逐渐模糊,身体逐渐衰老。

淮海战役支前有一条硬性规定:只能动员18岁以上的壮劳力上前线推车、送粮、护送伤员。这意味着,最年轻的支前民工在当年也已18岁,如今最年轻者已94岁,绝大多数已走到生命暮年或深居乡村老屋。寻访他们,不仅是与时间赛跑,更是一场与遗忘抗争的跋涉。

最初的线索来自王勇的家族。王勇从参与支前的亲人讲述的故事出发,手工画出“支前地图”,标注曾经去过的村庄和支前路线。老人们还记得同行的人是谁,哪个村还有谁曾一起推车,在哪个地方遇见了解放军。他们成了第一批“线人”,引着王勇走入这段沉埋已久的民间记忆。

接下来,就是“裂变式推荐”。每一个支前民工讲完自己的故事后,几乎都会说:“你还可以去隔壁村找某某,他当年也去了。”于是,王勇不断跨村庄、跨县区地追踪、拜访。这是一种极具人情味的“口口相传”调查方式,也是与官方名册之外的“沉默档案”的直接对话。

除了亲属推荐,王勇还深入历史记录较为密集的地区,比如山东的沂蒙山区。那里曾是淮海战役支前的主力区域之一,尤其是费县、蒙阴等地,支前人数众多。王勇查阅地方志、老报纸、县档案馆资料,圈出重点乡村,再“地毯式”拜访。见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就问:“老大爷,您当年参加过支前吗?”

判断他们是否真正参加过支前,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:他们讲述的细节是否完整且逻辑清晰。真正经历过的人,不会只说“我去过”,而是能说出在哪个时节、从哪里出发、推车去哪里、吃住怎样、解放军怎么和老百姓说话,哪位首长亲自来自村口动员……这些信息线索是无法伪造的历史纹理。

有些老人神志清晰,仍能回忆起战火中的每一个细节;而有的老人因脑梗萎缩、年老失忆,讲述混乱甚至断断续续。对于这类情况,王勇会寻找他们的同村人进行“集体访谈”,让另一位村民佐证或补充记忆,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。

拍摄方面,王勇采取“口述+实景+实物”相结合的方式。拍摄时,重点记录他们讲述过程中的表情、手势、停顿,甚至泪水和沉默。同时,也特别注意拍摄那些保存下来的实物——推车、旧饭锅、铁锹、磨盘、油灯。这些物件,是支前生活的真实见证,也成为后续建成纪念馆最打动人心的展陈部分。

除了常规走访和拍摄,王勇利用周末与节假日深入田野。多年来,他带着团队几乎踏遍豫东、皖北、鲁南、苏北等淮海战役支前主要区域,从一个个“熟人社会”中寻找“无名英雄”。这些寻访过程没有捷径,靠的是脚上的泥、心里的诚与时间的累积。

王勇：追寻支前民工的记忆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

2008年,摄影师王勇背着相机走村采风时,遇到了几位“特别老人”。这些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老人,居然都曾在淮海战役时做过支前民工。之后,他一头扎进对支前民工群体的寻访,一干就是17年。

在他的镜头下,那些老人满面皱纹,眼睛深陷,但眼神深邃又坚定,某一刻,还会像星星般闪亮。王勇说:“我们不忘过去,是为了更好地奔赴未来。我们铭记他们,是为了不辜负这山河岁月的深情厚谊。”



2020年,王勇在山东寻访支前民工的手推车

危险和苦难如影随形

在寻访中,王勇听过无数动人的故事,有的早已随风散去,有的却刻在心中。

张保付老人,来自河南永城市侯岭乡呼楼西村,淮海战役时只有17岁。虽然年纪小,但一心想为前线做事。一次送担架回来,他刚走到村南,敌机呼啸而至,三枚炸弹落下,其中一枚在他身边爆炸,掀起的泥土劈头盖脸砸来,差点把他活埋。他说:“幸好是土,要是石头,我命就没了。”

可这次劫后余生并没让他退缩。村里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炮弹,他又第一个站出来请缨去挖。他还多次冒着风雪送竹竿到北杨庄前线,有一次刚拿到“收到条”返回不久,身后的三间接收屋就被炸成废墟。飞机在头顶轰鸣,机枪扫射,炸弹爆炸声不断,但张保付从未退后一步。他说:“前线拼命,我们在后方还能躲吗?”

94岁的蒋国栋,是河南永城市陈集镇蒋园村人。家境贫寒,兄弟四人,小时连树叶都拿来充饥。他从小就对共产党心存感恩,十来岁就干各种支前任务。淮海战役时,他是担架组组长,领着庄上的五个人,连夜从沙土刘集抬伤员到白庙集。

别人轮换抬担架,他几乎不下担,鞋子踩坏了,干脆光脚踏雪。夜宿草窝,用麦秸当被盖。冻得发抖,但他一声不吭,坚持到底。20多天下来,双腿腿筋拉伤,从此落下终身病根。可他说:“只要共产党能胜利,能有饭吃,苦不算什么。”他还记得战士们请他吃的那顿饭,胡萝卜白菜炖肉——这是他人生第一顿饱饭,至今念念不忘,每每谈及都会红了眼眶。

在安徽濉溪县,王勇见到了94岁的程祥庆。他本有些糊涂,但一提到支前的经历,话就像泉水一样流淌出来。那年冬天,他赤脚穿着破草鞋,牵着毛驴拉物资,走了五十多公里送到前线。雪大,天寒,鞋舍不得穿,新鞋贴在胸口,脚却在雪地里冻得发紫。

程祥庆还参加担架队,来回十几天转运伤员。有的伤员身上多处重伤,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们盖;有的无法进食,他就一口一口喂。担架又重,伤员又多,他和队友们靠着“铁肩膀”和“铁脚板”一次次穿行在冰雪中,把伤员转送到后方。

王勇一次次被这些支前民工的故事打动,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,而是因为他们真实。他们把苦难扛在肩上,把希望藏在心里;他们不怕苦、不怕死,只盼着这片土地能迎来光明。

在很多人眼中,如今这个和平年代,做口述历史,走访普通人,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只有真正踏上这条路,走进乡村、走进田野,走进九十多岁老人沉默的生活,才会发现,这条通往历史深处的路,远比想象的更艰难、更曲折,有时候甚至充满不可预知的危险。

这是一项没有授权、没有现成路径可倚的“民间计划”。但王勇知道,如果不去做,这些活着的口述者可能会在沉默中一个个凋零。他们的记忆,一旦失落,就再也无法重建。

但这条路并不是风平浪静。即便是在和平年代,困难和危险仍然如影随形。

最典型、最常见的情况,是“被误解”。在很多村庄,尤其是一些偏远农村,如果没有政府支持,突然拎着相机、拿着录音笔,还带着两三位志愿者上门,很容易被误认为“诈骗分子”或者“不法分子”。

王勇曾三次被派出所民警带走,有一次是在皖北一个村庄。王勇正

给一位老人拍摄口述视频,讲的是他当年如何深夜推独轮车给前线送军粮。正拍着,村干部过来了,询问王勇:“你们是谁?干嘛的?有介绍信吗?”王勇只能拿出“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证”自证身份。但他们很快质疑:摄影协会,为什么要问战争的事?拍老人视频干嘛?是不是想拿去做什么非法用途?

解释无效,对方直接拨打了110。王勇被带到派出所,接受了近一个小时的询问。最终,派出所民警听了王勇的动机和项目内容,也看了拍摄的样片,才安心放人。

除了人带来的阻力,来自乡村生活环境本身的“危险”,也层出不穷。王勇访谈的大部分支前民工,年龄都在94岁以上。他们大多独居。为了安全,他们通常养狗。那种狗不像城市里的宠物犬,而是土狗,看家护院的“战斗犬”。多数时候,它们在外人靠近院门时就狂吠不止,也有时候,它们根本不吠,一声不响地突然从角落蹿出,在毫无防备的时候,扑上来咬人一口。

王勇腿上至今还有一个牙印的疤痕,是在一个冬天下乡拍摄时留下的。那位老人听说要来拍摄,很开心,却忘了提前拴好狗。王勇刚下车,狗已经扑了过来。他躲避不及,被狠狠咬了一口。



淮海战役中民工支前用的独轮车

期待更多铭记与关怀

山东,不仅是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根据地,也是这场伟大战役中支前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山东人民用血肉之躯,用无数辆小推车,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。

十余次山东之行,王勇足迹遍及费县、蒙阴、沂水、平邑等县乡村。这些地方,都是历史上支前民工的重要来源地。在费县的一处村庄,他见到了92岁的老支前民工张大爷。老人满脸皱纹,声音颤抖地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——“我们叫那次行动‘南下’,推着车子,装着军粮,穿着草鞋,睡着地窝子,跟着部队往前走。”他说话时眼里泛着光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热年代。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支前民工的故事,2008年,王勇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最后的支前民工》的文章。文中讲述了四位分属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的支前民工代表人物,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,还原了当年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历史。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,许多来自江浙沪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读者,纷纷通过邮局向文中提到的老人们寄去钱款与慰问信。王勇还曾先后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,向大学生群体讲述支前民工的故事。

在访谈的过程中,王勇注意到很多支前民工如今生活条件并不好。有的独居老人身体状况差,子女不在身边,经济也比较拮据。于是,王勇在中国慈善总会发起了一个专项公益项目——“支前民工精神传承基金”,通过合法、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募捐,改善老人们的生活条件。

未来,王勇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“我希望能建立一个以支前民工为主题的纪念空间——无论是线上展馆还是线下展厅,让这些真实的故事、实物和资料得以永久保存与展示。”

同时,他希望通过出版图书、拍摄纪录片、组织学生研学、志愿服务等形式,把支前民工身上的那股精气神,从老一辈人的记忆中转化为新一代人的价值观,真正实现“历史为未来服务”。

面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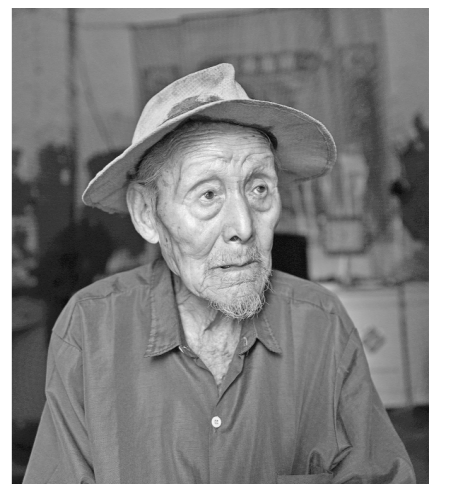
彭广荣：一家三口写进烈士册

彭广荣老人,今年九十七岁,是河南永城马桥镇姬庄人。她一家三口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,名字并排写进了烈士英名册。

彭广荣的父亲、哥哥、姐夫都是解放军战士,常年奔波前线。母亲曾被敌人捆在树上用棍抽打,只因拒绝透露亲人下落。她一声不吭,嘴唇咬出了血——“人抓走了,我不能再把他们出卖了。”

三位亲人先后战死沙场,家破人亡,可这个家没有倒。姐姐是村妇联主任,组织妇女纳鞋送粮,白天黑夜不歇。没布,就撕旧裤子;没鞋底,就拆自家的新衣裳。彭广荣记得,那年她刚穿上的新褂子,为了做鞋底,二话不说就撕了下来。旁边的婶子问:“刚做的,还撕啊?”她头也不回:“解放军命都搭上了,我还舍不得这一块布?”

如今老人坐在堂屋,给子孙们讲述家里的革命故事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咱们一家三口上光荣册,咱不亏。那仗,是咱老百姓拼命拼出来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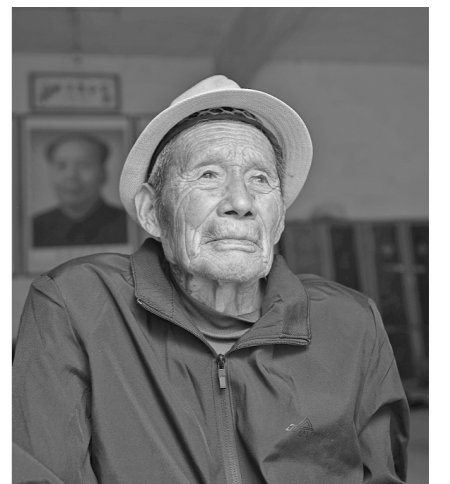
秦友章：一袋面，一辈子记得清

1948年冬,十八岁的秦友章跟随民工队,从河南省永城县龙岗乡一路往陈官庄送军粮。那年雪特别大,深到膝盖,推车推不动,只能一袋袋地往前扛。白天不敢走,怕敌军飞机轰炸,只能摸黑赶夜路。脚下不滑,整个人连着面袋栽进了路边的冰沟,棉衣湿透,腿脚瞬间冻麻。

但让他心疼的,不是冻伤,而是那袋粮食——袋口被划破,面粉撒了一地。那可不是一般的粮,是乡亲们省下口粮,一把一把攒出来的命根子。秦友章忍着心痛,把袋口扎紧,咬牙继续往前赶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一袋面能救一个伤员的命,不能让它丢在路上。

那时吃的是杂粮窝头,咽不下去也得吃。有次借房东的锅炒着吃,房东媳妇嫌他费柴火,他一句话不敢多说,心里却觉得委屈。但转念一想,家家都不易,锅能借来,已是恩情。

七十多年过去了,秦友章如今耳背、腿瘸,却还坐在炕头,把那一段段往事说得清清楚楚。



王效宗：抬担架也算打仗

王效宗老人生于战乱,如今已九十七岁的他,仍记得那一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。

1938年,日本侵略者攻陷永城,设据点、发良民证,百姓在恐惧中度日。那年,他还只是个年轻的农民,却被拉去为伪军搭寨工事,干了整整几个月,心里早已埋下仇恨的种子。

1948年,淮海战役爆发,王效宗被编入担架队。没有枪,没有刀,只有一双手和一副肩膀,跟在解放军后面抬伤员、送战士。照明弹把夜晚照得如白昼,炮火震耳欲聋。担架队得抢在第一线,枪声响起就冲上去,把浑身是血的战士抬下来。有时候,一个晚上就送出去一车车伤员,哭声和血腥味混在一起。

他的村后正是通往白马寺大医院的要道,九十里地,所有伤员都得从这儿经过。那段日子,村子变成临时驿站,炊烟与伤痛交织,沉重却庄严。王效宗说:“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打枪,但也拼过命。共产党不欺百姓,我们愿意跟他们走。”

(口记者 张九龙 整理)